

从收词特征看《日本馆译语》的实用性

蒋 垂东

The Usability of the *Ribenguan yiyu* in View of its Collection of Words

JIANG Chuidong

『日本館訳語』は明の礼部会同館が通訳を養成するために編纂した一連の中国語と近隣諸国および周辺民族の言語との対訳集の一つであり、中国最古の日本語教科書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る。収録数は566語となっていることから、通訳養成の教科書としては量が少なすぎて役に立た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の指摘がある。本稿では、所収する語句に着目して、中日双方の関係史料から、同書は会同館の業務に関連する「業務用語」が多数含まれ、実用性が備わってい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する。

1. 《日本馆译语》的内容与形式

在甲乙丙丁四种¹“华夷译语”中，《日本馆译语》仅见于会同馆编撰的丙种本，与四夷馆编撰的乙种本不同，它没有“来文”，只有“杂字”。也就是说仅有词语部分的对译。会同馆与四夷馆虽同属于礼部，但二者的

¹ 按石田干之助（1954）的分类：甲种本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翰林院何讲火源洁等编写的汉蒙对音手册，蒙语部分只有对音汉字，无蒙古文字；乙种本为成立于明永乐五年（1407）的四译馆编写的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百、暹罗等十种汉外对音手册，由“杂字”（词语）和“来文”（文章句子）两部分组成，外族语言除对音汉字外，还使用民族文字标记；丙种本为明会同馆编写的朝鲜、日本、回回、委兀儿、占城、暹罗、百夷、满刺加、安南、琉球等十余种词语对音手册，有“杂字”而无“来文”，外语的标记仅使用对音汉字，不使用民族文字。丁种本为清乾隆十三年（1748）四译馆与会同馆合并组成的会同四译馆编写对音手册，有“杂字”无“来文”。现存42种，除《琉球土语》之外，都有民族文字。

分工、职能不尽相同。如《登坛必究》卷之二十二“四夷总图叙”所述：

锡宴优赉宴、会同馆命部监重臣主之、各国赏赉有差，验其符信、设十三馆、通事译其语音、礼部辖之。设四夷馆、译其文字、太常寺少卿提督，亦礼部辖之。十三馆曰：朝鲜、琉球、日本、暹罗、安南、满刺、百夷、鞞鞞、女直、委兀儿、西番、回回、占城。

四夷馆承担的是“译其文字”，既外交文件的笔译工作；会同馆主要负责的则是“译其语音”，既口语翻译。为此，Wild（1945）将四夷馆的通事称为“translator officials”；称会同馆的通事则为“oral interpreters”。丙种本的十三馆中除朝鲜、琉球、日本、安南四馆外，其余各馆均与四夷馆编撰的译语重复，也就是说这些馆既存在着笔译方面的对音手册，又有口译方面的对音手册。对于日本、安南、朝鲜三馆只出现在丙种本的原因，如同Wild（1945）所指出的那样：

It may be pointed out that any Hua I I Yü 华夷译语 which contain Japanese, Korean, or Annamite vocabularies have no bearing on the Ssu I Kuan, since these countries used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由于这些地区同中国之间的外交文件从一开始就是使用汉语书写，无需笔译，这一点可以从《善邻国宝记》所收的多篇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文书（国书）得到印证²。虽然Wild在上面的叙述中没有谈及琉球馆，但我们认为《琉球馆译语》没有出现在四夷馆编写的乙种本里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日本馆译语》共收566条汉日对音词语，分：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人物、人事、身体、衣服、饮食、珍宝、文史、声色、

数目、方隅、通用等18门类。和丙种本的其他译语一样，在形式上《日本馆译语》也是先列汉语词目，然后附上与其相对应的日语的汉字对音。如：“天 唆喇”，“天”为汉语的词目；“唆喇”为与“天”相对应的日语“そらsora”的译音。

《日本馆译语》现在可以见到的版本共有七种：(1) 伦敦大学藏明抄本³，为马礼逊所赠，现藏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书末题注“嘉靖二十八年(1549)十一月望通事序班胡滂、褚效良、杨宗仲校正⁴”；(2)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明抄本；(3) 日本阿波国文库藏日本抄本⁵，原本失于火灾，京都大学语言研究室存有相片；(4) 日本稻叶君山旧藏抄本、原本失传于二战末期，日语语法学家桥本研一处藏有相片；(5) 韩国汉城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抄本；(6) 台湾珪庭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7) 慎懋赏《四夷广记》⁶

2 《善邻国宝记》三卷为日本临济宗相国寺寺僧瑞溪周凤(1391-1473)所编，内容包括垂仁天皇八十八年(公元59年，汉永平二年)至文明十八年(1486年，明成化二十二年)日中两国的交通史料，室町时代的外交文书尤受瞩目，其中所附的部分外交文书为周凤圆寂后，他人所增补。

日本国书如：“(永享四年 遣唐表) 天启大明，万邦悉被光贲，海无惊浪。中国兹占泰平，凡在率滨，孰不惟赖。钦惟

大明皇帝陛下，四圣传业，三边义安。勋华继体，从昔所希，宣光中兴，不签复睹。贡菲不入，固缘弊邑多虞，行李往来，愿复国光，伏献方物，为是谨具表。(卷之中)”据应仁二年(1468)开善寺僧人天与清启作为正使访明时(1468)的记录——《戊子入明记》记载：是篇国书的作者为“双桂和尚”。

中国国书如：“(同五年 大明书) 皇帝敕谕日本国王源道义。朕祇奉天命，嗣祖宗大位，以主兆姓。临御以来，夙夜孜孜。惟天惟祖宗之心，体而行之，绥抚天下，一视同仁。是以海内，凡日月所照临之处，慕义归化，悉顺悉臣。今者，王遣使道困奉表来朝，并献方物。敬天事大，具悉至诚。甚嘉之。……兹遣正使内官雷春、副使内官裴宽、王甫原，鸿胪寺少卿潘锡，行人高迁赏敕往谕。并赐王彩币等物，已示嘉悦之意。王其勉之，敬之用副朕怀。故谕。宣德八年六月十一日。(卷之中)” “皇帝颁赐 日本国王 白金貳百两、粧花绒锦四匹……(卷之下)”

3 伦敦大学本的书名为“日本国译语”。

4 “胡滂、褚效良、杨宗仲”与1539-1541年作为正使访明的策彦在他的《再度集》中多次提到的日本馆通事“温、胡、褚、杨”四人中的“胡、褚、杨”三人姓氏一致。另，伦敦大学本《满刺加国译语》的书末也有“嘉靖二十八年(1549) 日通事杨林校正”的题注。

5 书前有“从信禄”、朱之蕃(明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的“华夷译语序”、茅伯符(明万历二十九年进士)辑“华夷译语目录”，汉城大学本和台湾珪庭出版社影印本同。据福岛邦道(1968)称稻叶君山本和存于河内的杨守敬本亦有之。“从信录”引用的是《皇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四一(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条中翰林院伺讲火源洁等编类华夷译语的内容；冠有朱之蕃(明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的“华夷译语序”，据石田干之助(1944)考证：实为茅伯符《皇明象胥录》的序文，其作者为吴光仪，非朱之蕃(石田1944)，故此序不足为信。

6 据陈荆和(1967)考证，慎懋赏为王锡爵(1534-1610)的门人，该书成立于16世纪后期。

所收本。通过伦敦大学本的题注，可以确定《日本馆译语》的成书时间不晚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七种本子中，（1）和（3）所收词语相同，均为566条。（2）较（1）和（3）少1条。（4）～（6）因器用门至人物门缺一页，较（1）和（3）少23条。（7）较（1）和（3）多出数条，如人物门的“甲匠 约罗衣那撒亦谷”和饮食门的“煮 乜世哇磕斜”“饭饱 法喇福谷禄禄”等，前一条由人物门的“银匠”“铁匠”等类推而成；后两条分别与饮食门的“煮饭 乜世哇磕斜”“饱了 法喇福谷禄禄”重复，可见多出的条目并非新的内容。在上述这些本子中，多数学者认为唯一有题注，且为明抄本的伦敦大学本是目前已知的最佳版本。

有研究认为，丙种本《华夷译语》收词量太少，其中最少的《满刺加译语》只有482条；最多的《委兀儿译语》也才838条，难以发挥翻译教材的作用。本文认为此类译语都包含了许多专业词语，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下面我们将通过当时的中日交往史料来证明这一看法。

2. 《日本馆译语》所收的专业用语

明代日本以进贡的形式同中国开展官方的“勘合”贸易⁷，据史料记载，明朝期间日本共向中国派遣了十九批使节。在日本这些使节被称为“遣明使”，他们的船队被称为“遣明船”。遣明使团到达北京后下榻于会同馆，逗留期间除了同礼部等相关部门开展贸易谈判之外，还要进宫接受皇帝的“恩见”，朝拜时行“五拜三叩头”之礼。得到皇帝赏赐之后必须“谢恩”。《日本馆译语》的收词量虽然不大，但其中包含了大量朝仪、朝贡等会同馆涉

⁷ 据《大明会典》卷之一百五“朝贡一（日本国）”条记载：“（洪武）七年其国王良怀遣僧朝贡，以无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贡马及茶、布、刀、扇等物，以私贡却之。又以频年为寇，令中书省移文诘责。自后屡却其贡。并安置所遣僧于川陕番寺。十四年从其请遣还。……永乐初复来朝贡。赐龟纽金印，诰命封为日本国王，名其国镇山曰寿安镇国之山。御制碑文赐之，给勘合百道，始令十年一贡，贡道由浙江宁波府。每贡正副使等毋过二百人。若贡非期，人船踰数，夹带刀枪，并以寇论。宣德初遣贡不如约。谕使臣自今，贡毋过三船；人毋过三百；刀剑毋过三十。嘉靖六年奏准：凡贡非期，及人过百，船过三，多挟兵器，皆阻回。”

外方面的专业用语。

2.1 遣明使团成员的名称

“人物门”的“正使（=申司）、通事（=度日）、居座（=各撒）、土官（=都贯）、和尚（=吾苏）、从人（=吾只那非都）、官人（=殿原）、客人（=马罗都世）⁸”均为日本遣明使团的主要人员，其中与“居座”“土官”相对应的对音“各撒”和“都贯”在日语中尚未得到证实，但中日双方的文献记录都证明他们确实是日方遣明使团的成员。（括号内=的右侧为日语对音，据伦敦大学本，下同）

中方文献，如：

《大明会典》卷之一百五“朝贡一（日本国）”条：

（嘉靖）二十九年定，日本贡船每船水夫七十名，三船共计二百一十名；正、副使二员，居座六员，土官五员，从僧七员，从商不过六十人。

《大明会典》卷之一百一十一“礼部六十九 给赐二”（日本国条）：

差来正副使每员金衲袈裟一领、镀金银钩环直裰一件…居座以下土官、从僧、通事、从人有差。

日方文献，如：

《善邻国宝记》卷之下所收景泰贰年（1451）的日本国书：

日本国今填本字柴号勘合壹道，为朝贡事。今将本船装载方物并人员

⁸ 与“客人”相对应的“马罗都世”所注的是周良策彦在渡明集中提到的“客众”的读音。

姓名，开坐于后。须至咨者，今开：

一、表文一道

一、贡献方物

马二十匹、撒金鞘柄太刀二把、硫磺一万斤、马脑二十块、贴金
屏风三副…

一、专使壹员

纲司 居座 从僧 土官 通事 从人 船头壹名 水夫

右咨礼部

景泰贰年捌月日咨

《戊子入明记》中的日方“景泰五年（1454）勘合文件”中还记录了
各主要成员的名字：

（一号船）

正使清启天与和尚 从僧同宿听叫仆 已上拾壹员

居座妙增 同宿仆 以上八员；居座绍本 同宿仆 以上八员；

土官全果 同宿仆 已上八员；土官重幸 殿原中间 已上八员；土官目
听周能 已上八员；惣船头 仆 已上二员；柴通事 仆 已上二员；沈
通事 仆 一员；

力者净因；船头门司五郎左卫门祐盛、知库三郎太郎；肋船头右马次
郎

二号船…

三号船…

周良策彦（1501～1579）的《初度集（1538～1541）》和《再度集（1547
～1549）》中也详细地记载了遣明使团主要成员的名号及其在访明过程中

的各种活动。当时日本的对明贸易为大内氏、细川氏等大名所垄断，与“人物门”中“头目”相对应的“大妙”就是“大名”的读音。据牧田谛亮（1959）考证：遣明使团由三艘遣明船组成，“正副使”通常由著名的高僧担任；“从僧”为正使的随从；“居座”多从临济宗的五大寺院或与这五大寺院有关的僧人中选任；“土官”多由垄断对明贸易大名的重臣担任，他们是遣明船的出资方；“从人”又称“同宿”是“居座”和“土官”的随从；由于正副使等主要官员不会说汉语，所以各船均配有汉语翻译“通事”⁹。此外，与“官人”对应的“殿原”为低级官员；与“客人”（又称“从商”）对应的“马罗都世”则为商人代表。

“人物门”的“外郎（=卖老）、皂隶（=世木别）、大人（=倭亦非亦多）”等则是与贡使接触频繁的礼部的工作人员。“外郎”为“员外郎”的简称。明朝礼部主客司“分掌诸番朝贡接待给赐之事”的官员为“郎中、员外郎、主事”¹⁰，《策彦和尚再度集（下）》所记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廿九日拜访礼部时的情景中就有“外郎点茶来”的记录。在日本使节的访明游记中，会同馆的官员多被写成“~大人”。“皂隶”则是衙门里的差役，礼部直堂配备四十八名，四夷馆配备十二名¹¹。

遣明使团上岸后，由宁波走水路前往京城，不难想像“器用门”中的“船（=福聂）、桅（=法世喇）、篷（=贺）、櫓（=罗）、船来（=福聂那急答里）、船去（=福聂那亦急）”、“地理门”中的“河宽（=嗑哇纳盖世）、河窄（=嗑哇斜巴世）、水深（=民足福加撒）、水浅（=民足阿撒撒）、到岸（=足急毛世）”、“宫室门”的“馆驿（=叶急尼）”等亦与遣明使团有关。

⁹ “通事”多由华人承担。如1451年遣明使团的“赵文端”；1468年遣明使团的“柴通事、沈通事、薛通事、张通事、林通事、院通事”；1539-1541年遣明使团的“吴(荣)通事”；1548～1549年遣明使团的“吴(荣)通事、郑通事”等。

¹⁰ 见《大明会典》卷之一百五、礼部六十三“主客清吏司”条

¹¹ 见《大明会典》卷之一百五十七、兵部四十“皂隶”条

2.2朝仪用语

贡使进京后，下榻于会同馆，其间要进宫接受皇帝的“恩见”，上朝之前必须先到达鸿胪寺习礼亭学习朝仪。从日本遣明使留下的纪录，可以知道“文史门”的“习礼（=列那纳酪）”、“人事门”的“鞠躬（=各世各各木）、拜（=吾阿乜）、跪（=非撒南都杰）、叩头（=南都急都急）、兴（=吾答的唆亦）、平身（=各世吾那必约）、赏赐（=非近的木那）、谢恩（=收世）”等都是与朝仪有关的用语。

僧人笑云瑞訢在他的访明游记—《允澎入唐记》¹²中写道：

（九月）廿七日 官命入鸿胪寺习礼亭习朝参礼。

廿八日 朝参长安街……奉天门见皇帝，官人唱鞠躬、拜、起、叩头、平身、跪叩、快走阙左门赐宴，宴罢，又趋端门跪叩而出，谒礼部院……

十月一日 朝参奉天门见天子，朝仪如前，赐宴阙左门。

曾先后两次入明的周良策彦在他的《初度集》下之上（嘉靖十八年十月七日至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中有着更加详实的记载：

（三月）五日 斋后。假称大通事者。纱帽二员来。各习朝拜之礼。

六日 巳刻。正使及予·两居座·从僧以下从人到鸿胪寺。各于习礼亭前。

刷衣消拜。榜亭以“习礼亭”三大字。

七日 寅刻。朝拜。正使及予·两居座·从僧各跨马。大通事前导。从东门右腋而入…中央有门。门三口。竖揭

¹² 允澎：临济宗京都天龙寺主持，1453年任正使访明，1454年病死于归国途中。该书为随行僧人笑云瑞訢所著。

“午门”二大字。于此门前拜。

最初除中路。立班于东掖。正使及予相并而立。其后
两居座・从僧以下既从人次第立。少焉。官员唱以“上
来”。诸列班于中路。唱以“鞠躬”。

各深揖低头。又唱以“拜”者五。又唱“兴”。起来之
义也。各消拜者五度。拜彻未起。唱以“叩头”。各顿
首者三。又唱以“平身礼毕”。

各开了。左右有门。如此门少许而设座及案茶饭。二
大通事前导。各就座于西。酒三行而彻矣。又到前路。
立于左畔。又唱以“上来”。唱以“跪了”。各刷衣而跪。
唱以“叩头”。各顿首者三而退。

2.3 筵宴与稟食用语

外国贡使在北京期间，礼部按例在会同馆举办由大臣主持的“钦赐筵宴一至二次”¹³，日本使臣为二次，外加回程“宁波府管待一次”，至于筵宴的标准“筵宴番夷土官桌面”¹⁴有明确规定。辞行时有“见辞酒饭”的宴请，其标准在“番夷人等朔望朝见及见辞酒饭”¹⁵中也有明确规定。回国途中“差官伴送，沿途备办饭食，经过去处茶饭管待”¹⁶。遣明使逗留期间的伙食由中方承担。据《大明会典》卷之一百十五 礼部七十三“膳羞二・下程・番夷土官使臣下程”记载，遣明使回程的伙食标准为：

五日下程一次，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酒二十五瓶数、米五斗、面十二斤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蔬菜厨料

¹³ 见《大明会典》卷一百十四・礼部七十二“管待番夷土官筵宴”

¹⁴ 见《大明会典》卷一百十四・礼部七十二

¹⁵ 同上

¹⁶ 见《大明会典》卷一百十四・礼部七十二条“管待番夷土官筵宴”

日本使臣也在《驿程禄》（天龙寺妙智院所藏史料）中详细记录了中方所提供的伙食标准：

嘉靖十八年贡船禀给：

米 五升、肉 八两、油 四两、盐 四两、酱 四两、醋 四两、茶 四
勺、酒 三斤、笋 三斤、萝卜 三斤、花椒 四勺、烛 六枚、柴 三十
斤、炭 六斤以上十四色

由此可见《日本馆译语》“饮食门”中的“茶（=扎）、酒（=撒急）、汤（=由）、油（=安不喇）、盐（=世倭）、酱（=米宿）、醋（=寺）、饭（=乜世）、肉（=世世）、饼（=牙急莫只）、面（=烧夫）、糖（=撒刀）、花椒（=三肖）”、“花木门”中的“桃（=莫莫）、枣（=纳都密）、菜（=塞）、柴（=急）、米（=各乜）、竹笋（=答杰那各）、萝卜（=大根）、果子（=木那哇）”、“鸟兽门”中的“鸡（=它立）、鹅（=干）、羊（=非都世）”等都与会同馆此方面的业务用语相对应。

2.4 贸易用语

遣明使进贡的贡品被称为“方物”，实际上就是贸易商品。使团进京后，将“方物”送至礼部查验，查验完毕，皇帝降圣旨（“敕书”）给赏，得到“赏赐”后，使臣要“谢恩”。礼部向使臣所传达之关于朝贡的相关规定被称为“法度”¹⁷。“人事门”的“进贡（=嗑得那）、摆着（=纳喇别）、方物（=木那哇）、赏赐（=非近的木那）、谢恩（=收世）、法度（=巴都各）”和“文史门”的“敕书（=着谷少）”等反映了这一整套程序。

至于日本方面所贡的“方物”，中日双方的官方及民间的记录都有较

¹⁷ 天龙寺妙智院所藏史料之《大明谱》中有“六月一日に四艘共に定海入。但十年一貢新法度之儀をかたく従大人申渡也”

为详细的记载。如：

《大明会典》卷之一百五“朝贡一”记载的“日本国贡物”如下：

马、盔、铠、剑、腰刀、枪、涂金装采屏风、洒金厨子、洒金文台、洒金手箱、金银酒海、金银粉匣、玛瑙、象牙、螺壳、海巴、褶子扇、泥金扇、生红铜、锡、生熟夏布、牛皮、降香、木香、速香、丁香、檀香、黄熟香、苏木、乌木、胡椒、硫磺、磨刀石

《筹海图编》卷二“倭国入贡事略”的记载为：

马、铠、硫磺、贴金扇、牛皮、枪盔、苏木、涂金装采屏风、剑、洒金文台、玛瑙、描金粉盒、描金笔盒、水晶数珠、抹金提铜铍

《善邻国宝记》卷中所收1475年日本国王致明朝皇帝的国书所记载的“谨奉方物”有：

马 四匹、散金鞘柄太刀 二把、硫磺 一万斤、马脑 大小二十块、贴金屏风 三副、黑漆鞘柄太刀 一百把、枪 一百把、长刀一百柄、铠 一领、砚 一面并匣、扇一百把

《戊子入明记》详细记录了1468年遣明船所载货物的名称和数量：

御铠 一领、御太刀 百振、御长刀 百振、御枪 百挺、御屏风 三双、龙御太刀 二振、御砚箱 一、御扇箱 一、御书箱 一、御旗 一流、御幕 二帖、马脑 数大小 二拾、硫磺 一万斤、御马 二十四、御太刀 八百五十张、御扇 二千二百本、御铍子提 百具、严金 百两、

苏方木 二千斤、赤铜。

由上可见：“器用门”的“盃（=干不立）、甲（=约罗亦）、枪（=牙立）、刀（=答只）、弓（=由密）、箭（=牙）、扇（=阿翁急）、香盒（=稿巴各）、屏风（=漂不）、砚匣（=司司立法各）、苏木（=司哇）、象牙（=糟那杰）、铜铔（=非桑急）、扇面（=阿翁急嗑倭）、小扇（=吾只哇）、沉香（=定稿）、白檀香（=别谷旦稿）”；“衣服门”的“夏布（=那那）”；“饮食门”的“胡椒（=谷烧）”，“珍宝门”的“铜（=阿各嗑聂）、玉（=亦世）、铅（=纳马立）、珍珠（=答马）、水晶（=民足答马）、硫磺（=鱼敖）、珊瑚（=牙马那答马）、琥珀（=它喇那答马）、玛瑙（=吾马那答马）、玳瑁（=嗑乜那各）、金壶（=谷嗑聂秃禄谷必）、金锤（=谷嗑聂撒干都急）”；“鸟兽门”中“马（=吾马）”等均与上述中日记录中的名称相对应。马是日本的主要贡品之一，由此可知“器用门”中的马具名称“鞍（=谷喇）、镫（=阿不密）、鞞（=世立盖）、辔（=谷都）、鞭（=木的）”亦与会同馆的业务有关。

“器用门”中的“阿味（=牙非）”，我们认为它是“阿魏”之误，“阿魏”虽然没有出现在与日本相关的上述文献之中，据《大明会典》记载，“阿魏”是“暹罗国”“爪哇国”“满刺加国”的贡品，在相关的译语中也能得到证实。“片脑（=兵卞）”也一样，它没有出现在与日本有关的文献里，却出现在“暹罗国”“彭亨国”“满刺加国”等国的贡品名册里。还有“鸟兽门”的“=海青（吾密那答各）”亦未见于日本的相关文献，而出现在“鞞鞞”和“女真”的贡品名册及《畏兀儿馆译语》里，这些词的对音均无法与日语对应。它们虽然与日本之间无直接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同属于会同馆的专业用语，所以被收入了进来。

对于遣明使的进贡，明朝廷每每回赐大量的物品。据《大明会典》卷一百一十一 礼部六十九“给赐二·日本国”记载：

永乐见赐国王官服、纁丝、纱罗、金银、古器、书画等物。宣德十年回赐国王纁丝二十表、里纱罗各八匹、锦二段、银二百两；妃银一百两。成化二十年回赐国王纁丝二十表、里纱罗各二十匹、锦四段、银二百两；王妃纁丝十表、里纱罗各八匹、锦二段、银一百两。差来正副使每员金裱袈裟一领、镀金银钩环直裰一件、罗褊衫一件、纁丝二匹。纱罗各一匹。绢六匹。铜钱一万文、靴袜各一双。居座以下土官、从僧、通事、从人有差。

天龙寺妙智院所藏史料十二《大明别幅并两国勘合》收入了永乐元年（1403）、永乐四年（1406）、永乐五年（1407）、宣德八年（1433）、宣德九年（1434）、正统元年（1436）、景泰二年（1451）、景泰五年（1455）、天顺八年（1464）等9次明朝皇帝“给赐日本国王”极为详尽的清单。其中、永乐元年的清单如下：

“颁赐日本国王妃礼物：

纁丝五匹

大红织金寿如意回纹一匹、白织金螭虎灵芝回纹一匹、紫织金嵌八宝西番莲一匹、绿织金金鸡鹵连云一匹

纱五匹

大红织金螭虎灵芝回纹一匹、绿织金缠枝宝相花一匹、大红织金嵌八宝西番莲一匹、青织金满池娇一匹、绿织金嵌八宝西番莲一匹

绢四十匹

大红二匹、木红二匹、桃红二匹、玉色二匹、绿二匹、白三十四
红雕漆器五十八件

盒三个

八角盆一个、顶刻人物故事、边刻四季花、足刻回纹隔子金、径

一尺三分、高四寸九分；圆香盒二个、一个刻宝相花、四寸三分、高一寸三分；一个顶刻人物故事、边刻回纹、径四寸三分、高一寸六分。

盘一十四个

八角盘二个、俱径一尺三分、高一寸三分。一个里刻太平雀栀子花；一个里刻太平雀葵花、并外刻四季花。葵花盘二个、俱径九寸九分、高一寸二分、里刻牡丹花、边刻香草。圆盘四个、一样二个：俱径九寸一分、高寸三分、一个里刻苍头石榴花、边刻石榴花；一个里刻山鸡葵花、边刻香草。一样二个：俱径一尺二分、高寸三分、一个里刻鸚鵡长寿花、边刻四季花；一个里刻山雀茶花、便可香草。一盘六个、条环样四个：一个里刻人物故事、边刻四季花、刻香草、径长六寸三分、阔四寸九分、高八分。一个里刻人物故事、边刻四季花、外刻四季花、径长七寸、阔五寸五分、高九分。一个里刻牡丹花、外刻香草、径长六寸三分、阔四寸九分、高九分五厘。一个里刻人物故事、边刻四季花、外刻四季花球纹、径长六寸五分、径四寸四分、高八分。圆样一个、里刻人物故事球纹、外刻四季花、径五寸七分、高八分。每花样一个、里刻里刻木地竹梅、边刻四季花、外刻香草、径五寸三分、高八分。

香叠二副

一副地盖四层、顶刻人物故事、边刻四季花、径一分、高三寸八分；一副地盖三层、顶刻人物故事、边刻宝相花，径三寸五分，高三寸四分。

花瓶一个

刻竹节四季花，足刻钱纹、径九分、高三寸一分。

桌器二桌 每桌垒十六件共三十二件。俱里黑漆、外刻四季花。

按酒碟 每桌五个共一十个、俱径五寸六分、高八分。

果碟 每桌五个共一十个、俱径四寸、高七分五厘。

葵花样托子、每桌一个共二个、俱里外刻四季花、径三寸七分、盘径六寸六分三寸。

葵花样鉴妆一副、鉴妆四屏、顶刻人物故事、边刻四季花、径七寸七分、高一尺一寸。

盘一个、里黑漆、外刻四季花。径八寸四分、高一寸七分。

碗五个

三个刻回纹四季花、径六寸三分、高三寸一分。

二个、刻回纹四季花、径五寸七分、高二寸六分。

永乐元年闰十一月十一日

通过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知道:“衣服门”中的“靴(=谷都)、袜(=那谷也)、帐幔(=嗑照)、绞丝(=数司)、官绢(=活见)、纱帽(=刊不立)”;“珍宝门”中的“金(=谷嗑聂)、银(=世禄嗑聂)、钱(=热尼)”;“文史门”的“书(=福密)、画(=叶)”以及“器用门”的“席(=木世禄)、碗(=扎万)、櫟(=撒喇)、桌(=少谷)、椅(=交谷禄谷)、香(=稿巴世)”等都与朝廷赏赐的物品名称相对应。

3.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同中日双方相关历史文献的对照,不难看出《日本馆译语》包含了大量的与会同馆涉外业务有关的词语,足以说明它具有难以否定的实用性。这些被证明确实使用过词语为我们了解16世纪的日语词汇提供了宝贵的实物,通过对这些词语的对音汉字的分析,也能为我们了解这个时期日语语音提供极大的帮助。

主要参考文献(按作者姓氏拼音序):

陈 荆和(1967)“安南訳語の研究(二)”《史学》第三十九卷第四号:

37-54.

- 大友信一（1963）《室町時代の国語音声の研究》东京：至文堂。
- 大友信一（1981）“中国・朝鮮資料の語彙” 《講座日本語の語彙 第4卷 中世の語彙》：289-310. 东京：明治书院。
- 福島邦道（1993）《日本館譯語攷》东京：笠間书院。
- 蔣 垂东（1994）“『日本館訳語』の「漢製和語」について”《森野宗明教授退官記念論集 言語・文学・国語教育》：313-330. 東京：三省堂。
- 蔣 垂东（1996a）“『日本館訳語』の基礎音系 —微母、疑母とゼロ声母の關係を中心に—”《国語学》184：80-92.
- 蔣 垂东（1996b）“ロンドン大学本『日本館訳語』の識語をめぐって”《筑波日本語研究》创刊号：73-83.
- 蔣 垂东（2003）“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所藏の『琉球土語』について”《国語学会平成15年秋季大会預稿集》：159-166.
- 京都大学国語国文学研究室（1961）《全浙兵制考日本風土記》京都：京都大学国文学会。
- 京都大学国語国文学研究室（1965）《日本寄語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国文学会。
- 京都大学国語国文学研究室（1968）《纂輯日本譯語》京都：京都大学国文学会。
- 牧田諦亮（1955）《策彦入明記の研究 上》京都：佛教文化研究所。
- 牧田諦亮（1959）《策彦入明記の研究 下》京都：法藏館。
- 浅井惠伦（1940）“校本日本譯語”《安藤教授還曆祝賀紀念論文集》1-56. 東京：三省堂。
- 申 明行等（明）《（重修）大明會典》台湾国风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
- 石田干之助（1944）“所謂三種本『華夷訳語』の『韃靼館訳語』”《北亞

细亚学报》第2辑：35-87.

石田干之助(1954)“『華夷訳語』といふ辞書”《图书》昭和29年2月号：
3-6.

天与清启(16世纪)《戊子入明记》东京：近藤出版部1930年刊《续史籍集览》
第一册所收本：469-502.

王 鸣鹤(明)《登坛必究》东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

笑云瑞訢(室町)《允澎入唐记》东京：近藤出版部1930年刊《续史籍集览》
第一册所收本：513-552.

郑 若曾(明)《日本图纂》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清刊本.

周 凤(室町)《善邻国宝记》明治三十四年刊行《改订史籍集览 第廿
一》所收本.

Wild, Norman(1945)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Ssu I Kuan 四夷(譯)
館(Bureau of Translators).*BSOAS* 11/3:617-640.

(付記 本稿は、『華夷訳語』與西夏字符国際学術研討会」(2013年12
月7-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與人類学研究所・北京)での口頭発
表をもとにまとめたものである。)